

呂 亞 力

魏鏞教授提出的三種解釋中共現代化的「途徑」(approaches)，甚有價值。我擬再添一種，即 John Kautsky 的看法：革命政權初成立時，領導者往往為革命者，比較狂熱，注意的重點不是建制化，而是意識型態純正度的保持，俟過一段時日。革命者漸漸凋零，老化或變質，領導者往往為「經理者」(managers)。這些人甚關心自己的既得利益，欲「建制化」來保障這種利益，同時在心態上比較重視現實問題。我想 Van Laue 在 Why Lenin? What Stalin? 一書中解釋蘇俄之變，大體上用此架構，其能否用來解釋中共，我不敢肯定，茲提出供參考。

任德厚教授一文，頗有趣，他認為毛澤東歿後中共面臨的難題是「合法化」(legitimacy)的危機。此危機之出現是由於毛的理論權威之動搖，此說我是同意的。不過他的討論僅限於中共幹部的心態，對於一般人民的心態，可能限於資料，涉及甚少。

譚溯澄教授之文論及中共科技與軍事的現代化，但較少涉及科技，重點在軍事。尤其是中共軍隊的武器裝備方面，譚教授有精闢的研究。軍事現代化之成敗還有一因素：即運用武器的人，尤其軍官團，可能限於資料，譚文未論及中共軍事人員之素質。

魏萼教授對中共經濟頗有研究，此文涉及頗廣，但未討論中共人口問題，我以為中共經濟現代化的困難之一是其龐大的人口。近年來中共節育雖有成效，但由於這方面起步較晚(較早時，毛澤東認為節育違反馬克思主義)。而大陸人口本來已甚多，即使一年增加百分之一或二，所新增之數就構成沉重負擔。

余延宙教授論及中共人才培養的困難，甚值得我們注意。對於人才，要讓其自由發展，不要多方限制，中共的「又紅又專」，造成的結果可能是「紅而不專」，或「既不紅，也不專」。

最後，擬一提的是：我們的中共研究，大多旨在暴露其弱點，如以上之論文，皆證明中共在公元二千年，無法達到鄧小平的現代化目標，我完全同意這種看法，但我以為中共研究不僅要說明為何公元二千年中共現代化不能達到其規定之目標，而且要能預估其可能護致何種結果。我的理由是：中共政權一日存在，我們與它就處對抗狀態，就應「知己知彼」，對它的正確了解，有助於我們本身的現代化計劃之訂立。